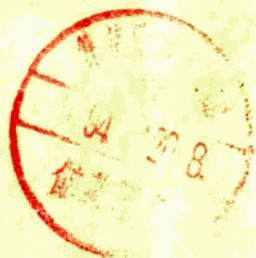


陈嘉庚丛书



留得光辉照人间

王毅林

①陈嘉庚丛书

留得光辉照人间

——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20周年

王毅林

1405497

集美学校委员会
集美校友总会编
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4.8

陈嘉庚丛书·7·

留得光辉照人间

王毅林

※

集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13千字

1994年8月出版印刷

印数：1—5000

留得光辉照人间

陈嘉庚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华侨领袖，是一位名震中外的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改革家，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华民族的杰出的代表人物。这位伟人的精神财富已超越国界，超越时代。它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它的光辉，万古流芳。为纪念这位伟人对人类文明作出的卓越贡献，国际小行星委员会特批准将天上的一颗明亮之星命名为“陈嘉庚星”。一颗带着陈嘉庚光辉的名字的行星，正在太空遨游，与日月同辉，宇宙共存。今年六月廿三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厦门时的重要讲话，再次高度赞扬陈嘉庚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江总书记指出：要发扬陈嘉庚先生爱国精神，重视教育的思想，努力办好教育，加快人材的培养。陈嘉庚先生是著名的爱国华侨，今年是他诞辰120周年，逝世33周年。毛主席赞扬他“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一生为祖国、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抗日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做了许多好事，周恩来对他评价：“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我们的国粹。陈嘉庚赤子之心，报效祖国，非常令人敬佩，他热心办教育，令人称颂、令人敬仰。厦门人民、福建人民、全国人民都应该永远怀念他，学习他。这次召开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再三强调，人材培养的基础在教育。经济要上去，教育就必须搞好，要弘扬陈嘉庚热心办教育的传统，把厦门教育事业办好，把精神文明建设好。陈嘉庚生活很俭朴，解放以后一直是这样，勤俭是中国人民的美德，陈嘉庚先生很值得我们学习，他很有钱，但真正有钱的生活上未必就奢侈，我们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

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父亲陈纓杞（又名杞柏），早年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以此谋生。

集美在同安县的最南端，俗称尽尾，后改称集美，当年以捕鱼和滩涂养殖谋生，是个一方二白的渔村，乡村的文化十分落后，女孩不得入学，十余岁儿童还光着屁股成群游戏，给他留下触目惊心的记忆，促使他日后办教育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

1842年，满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仗，厦门被迫成为“五口通商”的一个口岸，陈嘉庚亲眼看到厦门怎样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城市。鼓浪屿怎样成为外国侵略者共同占领的“公共租界”，外国殖民者在那里贩卖鸦片，设“卖人行”，运出“猪仔”，日本浪人横行霸道，走私犯、土匪、买办活动猖獗，集美家乡的人民忍无可忍，纷纷起来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者和清政府辱国丧权进行不懈的斗争，陈嘉庚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国难深重的环境下度过的。

集美在历史上有着光荣的传统，留有民族英雄郑成功部属爱国的遗址“国姓寨”，特别是他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祖国宝岛台湾等大量传说故事，深深感动并教育了陈嘉庚，他在

创办集美小学时，怀着真切敬仰之情，保存修葺了郑成功的部将刘国轩将军的炮台寨门和土炮，在一块巨石镌刻“延平故垒”四个字，并在旧炮台旁修建一幢起名为延平楼，以纪念郑成功的爱国功绩和他的民族精神。这样，集美这块土地，就成为全国闻名爱国者的圣地，郑成功的英雄事迹，也熏陶了陈嘉庚。

陈嘉庚从17岁开始侨居新加坡，长期经营工商业，先后开办三十多个工厂，一百多个商店，垦殖橡胶和菠萝园一万多英亩，雇用职工曾达到三万多人。由于他善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重视信誉，重视质量，重视经营管理和人才的培养，到1925年他已经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成为著名大企业家、百万富翁。陈嘉庚在新加坡经营实业三十年，他最早引进橡胶并进行大面积种植，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当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将橡胶制品打进国际市场，打破英商垄断国际橡胶市场的局面，此时他还在新加坡创办一批著名的华文学校，弘扬中华文化，培养数以万计的人才。他一生为东南亚居住地的资源开发繁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当时由于祖国贫穷落后，政府腐败无能，华侨犹如“海外孤儿”没有祖国的靠山，他以自身的经历，深深感到祖国的命运和华侨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陈嘉庚对祖国贫穷落后有切肤之痛，处处想以国民一分子之天职报效祖国。但他认为自己没有参加政治之才能，一人无力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他觉得“诚以救国既无术，亦只有兴学之一方”，于是他立下了爱国兴学的宏伟愿望。陈嘉庚在新加坡经营工商业，他发了财而不忘本，他没有忘记祖国，而是本着他生平

立下“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的宗旨，把一生所得的资财，几乎全部用于爱国事业，绝大总部份是教育事业。他认为“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一个海外华侨，办企业能够获得成功已是不容易，成功之后把一切成果献给祖国，献给家乡，献给下一代，更是难能可贵。他总是本着“财是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不遗财产给子孙，1919年陈嘉庚为筹备厦门大学所写的一篇“通告”，是一篇激动人心的爱国宣言。他说：“久留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并说“民心未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不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一日”。1919年“五四”运动促使陈嘉庚看到新的希望，他以愚公移山的气概回国筹备创办厦门大学。陈嘉庚创办伟大事业，在于他没有个人私利，只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陈嘉庚从1913年起，和他的胞弟陈敬贤一道，先后在他家乡集美创办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新加坡一批著名的华文学校，从而建立起一个从基础教育到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和华文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他在集美学校创建福南大会堂和在厦门大学创建建南大会堂，就象征着要在我国南方和福建南部，创办两个规模宏大振兴中华的教育基地。陈嘉庚又非常重视普及农村教育，制定了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计划分期实施赞助同安100所学校，闽南各地500所学校，总部设在集美。这个计划因受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没有全部实现。但是，陈嘉庚兄弟先后在集美、厦门和

闽南各地及新加坡等地创办资助和代办的各种类型学校，最新准确的统计是118所（以前统计为73所，不全），他兴办教育所用的资财几乎等于他的全部家财（按1980年估计）约一亿美元以上。1927年7月，我国的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讴歌陈嘉庚创办了“教育王国”。陈嘉庚办教育事业，确实是做到自己许下的“立志一生所获的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

陈嘉庚兴实业，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严选校长和良师，他一向认为“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办集美学校聘请叶渊、陈村牧、叶振汉为校长，创办厦门大学，聘请林文庆为校长，均是国内外一流著名的教育家。他十分注意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要求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并要求把德育放在首位，作为基础。陈嘉庚和胞弟陈敬贤认为不注重德育，教育有智育而无德育，如人身之有肉体而无灵魂。共同制定“诚毅”作为集美学校的校训，并谱写为校歌，以诚毅育人是陈嘉庚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对集美学校师生共同普遍的基本要求。他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并指出：父母怜爱子女是人生之常情，不可非议的。但他认为多留钱财让子女继承只能使智者丧志，愚者更愚。而最主要的是教育子女懂得道德，懂得如何做人，这样才是真正爱护子女。陈嘉庚这种精神情操，我国前科学院院长、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先生曾给予极高评价，郭沫若先生指出：“陈嘉庚为什么这样伟大？因为他所做的事不是为他自己，是为老百姓”。

在陈嘉庚爱国兴学的带动和影响下，广大华侨华人热心

兴学蔚然成风。在国内各地侨乡由华侨华人出资兴办的学校比比皆是。如建国前晋江县200所小学，4所中学，由华侨华人独资兴办的私立学校占90%。海外华侨华人也积极办学，据马来亚一带统计，华侨华人在当地兴办的学校，1911年有14所，到1940年增至1051所，近30年增加了70倍。陈嘉庚在海内外开创民办学校一代新风其深远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比他直接办的学校要大千百倍，正如前新加坡中华商会董事、陈嘉庚生前好友、著名的爱国侨领黄奕欢称赞的“南洋华人博得热心办教育的美誉，而这是起因于有了陈嘉庚先生，换言之，即起因于陈嘉庚先生所造成的兴学风气，嘉庚先生以前没有陈嘉庚，嘉庚先生以后不止一个继起的陈嘉庚”。如陈嘉庚长婿李光前，宗亲陈六使，他们除全力支持陈嘉庚创办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外，李光前先生还在南安创办国专学村，陈六使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大学，刘玉水在惠安创办荷山中学，集美校友李氏昆仲在安溪创办慈山学园（其中有幼儿园、小学、中学、慈山财经学校、慈山农中等系列学校），兴建安溪颍如大桥捐资厦门中山医院，并资助安溪湖头长坑等十多所小学。李先生除在安溪家乡办教育事业外，还先后在北京、福州、泉州、厦门等地资助北京燕京华侨大学、福州音乐学校、泉州黎明大学、厦门华侨博物院等文化教育事业超过壹亿港元。集美校友施先生在安溪办培文师范，集美校友梁披云集资在泉州办黎明大学，皆是继承和发扬陈嘉庚精神的范例。值得庆幸的，陈嘉庚事业的热心的支持者，闽籍著名的企业家吕振万先生，1987年以来，他先后向南安家乡水头、美林、官桥、金陶、九都、向阳、东田、蓬华等乡镇和南星中学、五星中学、华侨大学、泉州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

园、福建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和厦门第一中学等校捐资兴学，支持近百所的大、中、小学和幼儿园校舍和奖教奖学教育基金近壹亿元。并先后在南安等地创南字号企业集团27家，投资一亿多港元。1990年他在泉州投资土地成片开发，在荒山坡地建设蟠龙开发区，首期投资二亿港元。在闽南家乡，集美校友李先生昆仲和乡亲吕先生这种爱国兴学，建设家乡宏伟计划，在闽南家乡，是继陈嘉庚、李光前、陈六使之后的后起之秀。1984年陈嘉庚诞辰110周年，陈嘉庚友好庄希泉在回忆陈嘉庚先生时所写的《光辉旗帜耀千秋》的纪念文章时指出“满目青山夕照明”，当我看到陈嘉庚未竟功业，后人发扬光大感到由衷地喜悦。这是表达千百万华侨的心意。

陈嘉庚在新加坡深受孙中山的革命影响，对孙中山十分敬佩。1910年他和胞弟陈敬贤一道参加同盟会，积极参加赞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开始从商界投身到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中去。

陈嘉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从1923年创《南洋商报》鼓吹抵制日货，就在华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8年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担任会长，第一次把华侨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培养和训练一批爱国筹赈骨干分子。“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展开，南洋各地华侨抗日救亡情绪高涨，纷纷成立2794个抗日救亡团体。新加坡在叶玉堆等著名华侨领袖联合请求下，要求陈嘉庚出来领导筹赈工作。后来在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印尼侨领庄西言的共同倡组下，受国民党中央行政院长孔祥熙的委托，1938年10月10日由45个埠168位代表进行选举，选出陈嘉庚为总会机关主席，李清泉、庄西言为副主席，正式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简称南侨总会）。南侨总会是历史上第一次团结各种不同的信仰、各地域各阶层各职业的千百万华侨，组成抗日救国的社团组织。在南侨总会和陈嘉庚领导下，在报刊上发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的誓言。为此，东南亚华侨抗日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南侨总会促进南洋华侨大团结的盛举，为抗日救国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这是和陈嘉庚献身祖国及其强有力的领导分不开的。南侨总会领导筹赈运动，不带政治色彩，是一种单纯的爱国运动。陈嘉庚是一位无党派华侨领袖，不为任何党派服务，他又一向主张在当地法律许可下进行，十分审慎从事，为当地政府容许，不予干涉箝制，这也是他领导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据1946年广东省统计，南侨总会领导筹赈运动，从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至1942年日本南侵前夕为止，（抗战以来，我大片国土被占，民众遭难，国库空虚，财政枯竭，国际援助极为有限，赖以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财力，主要依靠华侨援助），华侨捐献的义款及家庭侨汇共70亿元国币，相当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用于抗战的军事费用的大部分；飞机217架，汽车500辆，救护车千辆，坦克27辆，大米一万包，捐赠寒衣30万件，奎宁丸5000万粒，还捐赠了军需医疗器械等；动员3200多名司机、机工及由许多医生护士组成救护队回国服务，从1939年滇缅公路通车到1942年5月公路被切断为止，通过南洋车队运回抗战物资45万吨。这些司机和救护队战斗在各地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后，陈嘉庚回国定居，曾先后二次到昆明贵阳等地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英雄战士进行探望和慰问。

1938年南京失守之后，汪精卫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与日本和平妥协的卖国路线。陈嘉庚闻讯之后，发表一系列函电及讲话，揭露汪精卫卖国求荣的可耻野心。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会时，陈嘉庚从新加坡发回“电报提案”，称“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获得会议通过，这个提案后来被邹韬奋称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1940年3月，陈嘉庚亲自率领南侨总会所组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南侨慰劳团”）回到祖国。当华侨慰问团到重庆机场时，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

“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国内情况很欠明悉。但是，我有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在惦念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热诚的心”。慰问团从3月初至12月31日返抵新加坡为止，共9个多月，对全国15个省进行慰问和考察，参加演讲百余次。这次慰问和考察，会见国民党军政及社会各界代表人物，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和朱总司令。陈嘉庚在回国慰问访问时，对当时蒋先生“要抗战胜利，必先消灭共产党”的言论，义正词严予以驳斥。同时一再希望“国共两党，真诚团结，共同抗战，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兹若不幸，国共两派意见日深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必痛心失望”。陈嘉庚到延安与毛泽东等人会晤，交谈中心议题一是抗战问题，二是国共合作问题。陈嘉庚说：我对国共两党的希望是：一是坚决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磨擦，等打败日寇后解决。毛泽东对陈嘉庚说：“共产党一贯坚持抗战，坚持国共合作。说实在

的，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不仅被蒋先生打得遍体鳞伤，而且他还悬赏要我的首级，但我请陈先生见着他的时候转告他，我对他并无恶意，只要他坚持抗日，我便拥护他的领导”。这次陈嘉庚回国参观访问，到了重庆和延安，耳闻目见，使他对两个地区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抗日态度，认识上发生一个飞跃变化。陈嘉庚到延安之后，所见所闻后高兴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从此，他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许多爱国人士因此称赞说，延安的小米饭战胜了重庆的山珍海味。

1940年3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到重庆、延安等地考察访问，他怀着对祖国一片忠心，坚持真理，伸张正义。却遭国民党当局的层层阻挠，先是派人跟踪，后又发出电报给英国驻新加坡领事馆，提出禁止陈嘉庚入境，国民党海外部部长亲自到香港、菲律宾、马来亚等地，开展毁谤陈嘉庚分裂侨胞的活动。但是陈嘉庚并没有因此怨叹，他说“我爱祖国，为什么祖国不爱我”。他认为自己的不幸，首先是祖国的不幸，他为了避免侨胞的分裂，在报上登出启事，声明辞掉南侨总会主席。但南侨总会在1941年3月29日至31日举行投票选举的结果，仍以151票赞成，1票反对，陈嘉庚继续当选为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大会发表宣言说，总会主席陈嘉庚，“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值此抗战期间，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会之组织，也不能无陈主席领导，总会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陈嘉庚随即致电国民参政会，要求国民党当局“消弭内战，加强团结”。在陈嘉庚的推动和影响

下,纽约华侨时报发出社论指出“抗战与内战不能并存……。”如今之计,恢复叶挺将军之自由,以开调解之道,乃为上策。菲律宾华侨团体,也致电国民党当局“大敌当前岂可同室操戈至使亲者痛,仇者快”,这股强大的舆论力量,积极维护国共合作,也是一个重要力量。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年12月8日,日寇在马来亚登陆,同时轰炸新加坡,陈嘉庚在其好友劝导下,也决定离开新加坡,但是由于他在率领华侨回国慰劳期间,仍凭着他一贯的主张“明辨是非,据实说话”的精神,对国民党党政要员的劣迹,进行揭发,不留情面。因此,陈嘉庚与重庆的关系恶化,他觉得国内无容身之地,有国归不得。于是,陈嘉庚于1942年2月3日,在友好刘玉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新加坡到印尼。他到印尼之后,在当地华侨和集美厦大校友黄丹季、郭应麟及夫人林翠锦、廖天赐、陈明津等人的舍身掩护下,于同年8月在东爪哇玛琅避难。在敌占区的危险环境中安全地渡过三年的时光,直到抗战胜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领导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日本侵略者对他深为仇恨。1942年2月日寇占领新加坡后,就提出悬赏100万元捉拿陈嘉庚,日寇四处搜查陈嘉庚,东爪哇覆被日寇占领之后,陈嘉庚就处敌人的包围之中。陈嘉庚在1942年至1945年避难于爪哇期间,置生死于度外,他是怀着“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诌事敌”心情,在敌人的鼻子尖下,在秘密的环境中,用一年多的时间,写成《南侨回忆录》,这不仅是一部陈嘉庚光辉一生的实录,更主要是反映南洋华侨一部奋斗史,一部南

洋千百万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爱国史诗，也是一部振兴中华的爱国史诗。它是一部传世佳作，在我国华侨史上永放光芒。前全国侨联主席、陈嘉庚生前友好张国基说过，陈嘉庚的名著《南侨回忆录》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在海外是两部最受海外华侨欢迎的巨著，在华侨中《南侨回忆录》的影响更大。因为陈嘉庚先生的话华侨觉得更亲切可信。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阅读该书后，认为“没有比这部著作更丰富更有魅力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6日陈嘉庚从雅加达回到新加坡，陈嘉庚安全脱险的消息，温暖了海内外爱国同胞的心，不久，新加坡500个社团联合召开盛大的欢迎大会。11月18日，重庆10个团体又联合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参加安全庆祝会共500多人。郭沫若、黄炎培、邵力子、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来了，到会者热烈赞扬陈嘉庚赤诚的爱国热情，他的高风亮节，得到海内外同胞的高度赞扬，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邵力子称赞陈嘉庚具有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的美德。毛主席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写祝词赞扬他“为民族解放尽最大的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诤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郭沫若的一席有血有泪的发言，指出新加坡和重庆各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的先后召开，表明祖国儿女与海外侨胞是心连心，这是陈嘉庚这样“建设性人物”的胜利，是任何“破坏性人物”破坏不了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当局发动

全面内战，一场由美国杜鲁门政府出钱出枪，蒋政府出人，替美国当局打仗杀中国人的内战开始，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谴责“美国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要求美国不再援助蒋介石政府，以使中国内战得已终止，人民痛苦可以减少”。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电邀陈嘉庚回国参政，共商国是，并委托陈嘉庚友好庄希泉（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侨联名誉主席）由香港专程到新加坡迎接陈嘉庚回国，陈嘉庚冒着因此会遭受新加坡殖民当局的阻挠，亲人受累，基业受影响，毅然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接着又在庄明理、王雨亭、张殊明等人陪同到东北各省进行两个多月的考察。1949年6月陈嘉庚回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典礼。他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情，是我们世代子孙幸福有关的一件大事情”。1950年他返回新加坡刊行《新中国观感集》，宣传新中国新面貌新气象。促进华侨热爱新中国。

1950年5月，他再次应毛主席的邀请，毅然离别了侨居60多年的第二故乡新加坡和数百人亲人骨肉，只身回到祖国家乡集美定居，投身于新中国建设的行列，充分体现他的“爱国本性”，再次实践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行”。后来，他又以一个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呼吁海外国民党人回到爱国的行列中来，共同推动祖国的统一大业。

陈嘉庚回到集美定居，仍本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训，身教言传，以身作则。人们参观他的故居看到他那“老”字号的住房，古老的床，古老的写字台，古老的沙发，古老的蚊帐。衣着极其俭朴，“补”字号外衣，

裤子、鞋子、袜子也都打补丁。他担任中央高级领导职务，政府给他每月工资定为行政三级，每月390元，加上地区补贴，合计539.8元，他规定自己的伙食费每月15元，余款存入银行，作为集美学校建设基金。他经常吃番薯粥配花生米，豆干、豆乳，加上一道鱼。他用家乡风味蚝煎、炒米粉和猪蹄芋招待陈毅、方毅、方方和蔡廷锴等客人。曾在陈嘉庚身边工作10多年之久的张其华同志说，陈嘉庚的内衣、袜子、手帕一直是自己洗，到了晚年，还是经常自己洗，即使是患了不治之病，生活上许多事情仍然坚持自理。陈嘉庚是一代伟人，华侨领袖，但他却是过着极为俭朴的平民式生活，他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百万也不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钱也不要浪费”。

1950年底，陈嘉庚在新加坡结束了合营企业，把全部余款汇回国内，并取得陈六使、李光前的支持，着手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集美解放纪念碑和厦门华侨博物院四大工程，1950年9月他回集美家乡定居，从此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建设事业，他制定“重建集美学村计划”，立即付之实现。陈嘉庚就这样为集美学校扩建建筑面积达十六万平方米校舍，等于建国前校舍总面积三倍多，投入建设费用1025万元，其中有当时称为厦门市最高的建筑物“南薰楼”，有可容纳两千多人的福南大会堂和可容纳三千多观众的体育馆。从规划、设计、备料到施工他都亲自过问，群众称他为“总工程师”。从1951年到1954年，由他筹捐经费，设计、监督施工建筑厦大校舍总面积六万二千六百平方米，计用一幢大楼，相当于建国前总面积的一倍。其中有可容纳观众二万人的体育场，游泳池面积六千平方米，建南大会堂的